

MR
国外新闻界名人译丛
GWSW19911124



女人与神话

Oriana Fallaci

奥丽亚娜·法拉奇传

THE WOMAN AND THE MYTH

[美] 圣·阿里科 著 李青藜 译

SANTO L. ARIC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 / (美) 阿里科著；李青藜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

ISBN 7-5011-4608-X

I. 女… II. ①阿… ②李… III. 法拉奇 - 传记 IV. K835.4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502 号

Oriana Fallaci: The Woman and the Myth
by Santo L. Arico

Copyright © 1998 The Board of Truste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2253 号

女人与神话

奥丽亚娜·法拉奇传

[美] 圣·阿里科 著

李青藜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49,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608-X/G·1705 定价：20.00 元

致中国读者

我在撰写《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的过程中始终乐此不疲。尽管多次遇到困难和挫折，我却从未有一刻后悔过这一决定：在未经法拉奇授权的情况下写作。这一决定使我能独立自主地披露真相、陈述意见，而无需担心受到审查。此书的圆满完成为我生命中的“法拉奇阶段”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不久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李青藜通知我新华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的中文版，而她已经基本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工作。我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但经过考虑，我感到此书的第一部外文版在中国出版是最恰当不过的。

法拉奇常常热烈地谈起她的三次中国之行。第一次是在1980年，她前往中国采访副总理邓小平。几个月后她随同珀蒂尼总统的官方访问团重返中国。那次她与聚集在她下榻的饭店前的中国学生交换了意见。第三次是在1993年，她在妹妹宝拉的陪同下自费前往中国。在北京，她会见了众多的中国记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出席了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官方晚宴，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以自由为主题的演讲。

1997年3月28日，新华社的毛众役先生寄给我一张表现邓小平接见法拉奇的情景的照片，这就是出现在我书中的那张唯一的照片。他的热情帮助无异于雪中送炭，因为我在下定决心写一部未经法拉奇授权的传记的同时，也失去了从法拉奇处获得照片

的机会。然后，1999年8月10日，一封来自中国的译者来信使我的“法拉奇阶段”又有了下文。

衷心感谢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李青藜的辛勤工作。我希望中国读者喜爱并欣赏我的叙事方式和书中所包含的事实。作为一名住在一个只有一万居民的密西西比小镇的作者，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有此机会，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圣·阿里科

1999年8月27日

致 谢

感谢查尔斯·康拉德，罗伯特·弗里士曼，詹姆斯·马可斯，约翰·辛普利，我在为这本书的写作作准备时对他们进行了电话采访，承蒙他们同意，允许我使用他们提供的材料。感谢我的同事（他们人数众多，难以一一列举）和密西西比大学约翰·戴维斯·威廉姆斯图书馆的所有职员对我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密西西比大学的文学院、研究生院和现代语言系对我的财政支持。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爱和无条件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从构思到出版的历程将会令人难以忍受。

序 言

法拉奇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采访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迄今她已获得国际声誉。她的大部分作品已被翻译成各国文字行销全世界。反堕胎积极分子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都热衷于研究《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并都声称该书证明他们在人流问题上的立场是合理的；作者的妹妹宝拉在拉普兰^①采访一则新闻时，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发现了一本《男子汉》。这间屋子的主人——一个穷苦的驯鹿牧人，把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法拉奇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美国的教授们用《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来讲解法拉奇的采访技巧；当霍梅尼在圣城库姆^②接见她时，手头有不少她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法拉奇所获的正式荣誉中包括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空话与祈祷》获意大利班卡莱拉奖；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她还获得了班卡莱拉特等奖；《男子汉》获享有盛名的维阿莱吉奥奖；《印沙安拉》^③获海明威奖，该书还获得国际安提伯斯奖；有关海湾战争的报道获麦西纳最佳新闻报

① 拉普兰 (Lapland)：北欧一地区，指拉普人居住的地区。——译注

② 库姆 (Qom)：伊朗西北部城市，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译注

③ 印沙安拉 (Inshallah)，穆斯林把自己的心愿托付给安拉时的诵言，意为“如安拉允许的话”，或“如蒙天佑”。——译注

道奖，等等。

法拉奇在纽约市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中已经居住了25年之久，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地址。她的家不大，是一幢褐砂石房屋，带有一个很小的后花园，花园里有几棵树，家鸽、野鸽和麻雀视其为乐土，常成群结队地在里面活动，屋子里摆满了她的心爱之物——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和古老的书籍。她的财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套极其罕见的出版于18世纪的插图版莎士比亚全集。她是这个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始终不曾失去那份神秘感，始终带有对抗的态度，始终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尽管她是出于种种原因和目的才选择居住在美国的，但却一直是一名忠诚的美国人，而且从未后悔过这一选择，只是，她也常常回到自己深爱的佛罗伦萨。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序言

致谢

引言：寻求真相·····	(1)
第一章 佛罗伦萨·····	(10)
第二章 吉卜林、伦敦、海明威·····	(28)
第三章 灯光、相机和行动·····	(44)
第四章 中心舞台·····	(63)
第五章 伸手够月·····	(84)
第六章 东南亚的电影银幕·····	(115)
第七章 阳台上的超级巨星·····	(136)
第八章 终生表演·····	(147)
第九章 生，还是死·····	(185)
第十章 是男子汉，还是女中豪杰·····	(206)
第十一章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拉奇·····	(226)
结束语：直面病魔·····	(261)
注释·····	(268)
附录：法拉奇作品目录·····	(308)

引言：寻求真相

1980年，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法拉奇的《空话与祈祷》，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从那一刻起，我与她之间开始形成一种亲密、感人而又高度紧张的关系。本书，《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的出版使这一关系达到了高潮。与法拉奇的接触改变了我的生活。她对美国卷入越战所持的观点对我影响至深，以至于我写了一篇题为《真理的发现：评奥丽亚娜·法拉奇的〈空话与祈祷〉》的文章^[1]。阅读了《风云人物采访记》中她对亨利·基辛格、英迪拉·甘地、穆阿玛里·卡扎菲、果尔达·梅厄等政治巨头的采访记后，我冲动地撰写了《打破坚冰：就奥丽亚娜·法拉奇采访技巧的深入研究》^[2]。读完《给一个从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和《男子汉》之后，法拉奇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了。解读她的作品成为我的个人嗜好，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她的新闻报道与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领悟对我撰写《奥丽亚娜·法拉奇的新闻小说：〈空话与祈祷〉》影响很大（后来该文被收入我主编的《意大利当代女作家》一书）^[3]。我这个美国南部居民有如中了法拉奇的魔咒，从此改变了生活节奏。当她在1991年7月3日寄给我一本《印沙安拉》时，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提笔写信给她，询问她是否能支持我探寻她的生命旅程了。

特别能刻画出法拉奇职业生涯特征的是她一生的心路历程。

她是一名记者，同时又是一位文学作家。撰写小说并把自己从新闻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热望在她的生活中占有支配地位。但是，树立自己形象的愿望远远超过这种精神动力。正如她自己指出的，她就像森林中的野蘑菇每到雨后都再长一茬一样，在每一部作品中都诞生一次。她的生动描绘都是真实的，不是捏造的。在一篇接一篇的文章和一部接一部的书籍中，野蘑菇——而不是被人精心浇灌的玫瑰——一次次诞生，每一次形象都略有差异。就像迈克·杰克逊和麦当娜一样，法拉奇不是生产商或经纪人的产品；她，就是她自己，就是那位笔下流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印在纸上的作家。

1991年10月3日，法拉奇给我写了一封鼓励的信，之后在电话里向我讲述了她的生活经历，还和我在纽约会了面，结果这位作家本人对我的吸引力超过了她的写作方法使我产生了倾慕之情。我必须找到法拉奇现象背后的原因。她的生活既深受她写作生涯的影响，又决定了她作品的内容。她的情人亚历山大·“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在遭囚禁期间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真正的诗篇。她的成就超过他的成就，因为她是在用自己生命写书。她所写的每一件作品都泄露了她的教育背景，她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全都在我的书里……因为我是个非常真诚的作家……因此，不管是在写邓小平还是在写霍梅尼，我都在暴露自己。”^[4]评论家们从来不曾领悟到自我表现一直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不断地改变和歪曲着真实的客观世界，使这个世界呈现出法拉奇式的形态和清晰度，而这一点，如果不打着法拉奇之名的话，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5]。法拉奇掌握的材料通过她个人的主观过滤，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有纪念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经过了高度个人化的艺术加工。其最终结果就是创造出了一个个迷人的、生机勃勃的形象。

1991年12月，奥丽亚娜·法拉奇在曼哈顿的家中接见了我们。

她热情又文雅地欢迎我的到来，驱散了我的紧张情绪。在起居室里的舒适气氛中，我们讨论了她大受欢迎的原因以及她称之为自己生命中的“爆发音”和“化学现象”的东西。1992年7月，我在意大利对她进行了两次现场访问：第一次是在米兰她妹妹宝拉的家里，那时她刚接受完乳腺癌手术；第二次是在佛罗伦萨她的公寓里。那套公寓位于波塔罗马纳上方的住宅区。1993年3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在纽约又见了一次面，为期两天。一个月之后，4月6日，我打电话给住在佛罗伦萨的法拉奇，发现她精神沮丧。大夫们无力缓解她因癌症引起的不适。

一次次的电话交谈和在纽约、米兰、佛罗伦萨的会晤，加上她的作品和评论文章，共同形成了对这位女性的印象。她把自己的生活转变成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影像，并利用自己的文学天才保障了这些影像之间的有效联系。一位英国评论家为神话所下的定义概括出了法拉奇的精神动力：“神话就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故事。”^[6]在法拉奇的例子里，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并把她本人突显在作品的内容中。她带有仪式性质的惯常行为使读者能够发现她、观察她，并体验她在进行自我揭示时感受到的乐趣。有力、真实的风格和聚光灯的不断照耀加深了她的神话色彩。她的读者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上的焦虑。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的典型代表，正如当年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

法拉奇流露出愿意合作撰写一部职业传记的想法后，我很快就发现了她的真实意图。她将会对我书里的每一部分都进行修改，以塑造自己的公开形象。我将成为她的手段，她的工具。她会解释自己的作品，纠正我的陈述，断言哪些是真的，指出哪些信息是伪造的——哪怕这些信息来源于业已经过证明的材料；她会列举她所选择的事实，并将自己捏造的东西公诸于众。实际

上，她挥舞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她要仔细审校我的手稿。我很可能只拥有解释、分析她的写作风格和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不能使用任何有关她童年生活的材料，因为她准备在自己即将撰写的下一部小说中使用这些材料。她希望我的书仅仅是一本有关她思想经历的书。最终，我开始明白我的角色就是为她希望自己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那一形象进行修正和润色。

法拉奇迅速设定了界限。从二战至今，她所了解到的所有新闻事件，哪怕是向她我讲过的，都归她独享，只能用于她本人将出版的书籍。她强调说要审读我的草稿以确保我没有使用将用于她下一部小说的材料。我同意尊重她的意愿，因为我的参考依据主要是在几次会谈中她直接向我吐露的东西，但我从未答应过不使用有关她青年时代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早已出版，并已构成她书籍和文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出版意大利文版时，她撰文对此书进行了介绍，这篇题为《介绍》的文章里大量地涉及到了有关她的父母、姐妹和她的童年生活的内容。而一份意大利杂志对她妹妹宝拉进行的采访中也充满了这些内容。但是法拉奇坚持要我她从她开始为报刊撰稿的那一天写起。

法拉奇希望我的书是一部职业传记，其内容仅限于对她小说的艺术分析，绝不涉及其它领域。她希望自己是作为伟大的作家，而不是记者，为世人所铭记。她把任何对她早期作品（几部文集）的强调都视为对自己的贬低。（后来她取消了这一要求，反过来坚决主张我的书必须涉及到她的早期作品。）她向我提供了叶夫根尼·扎穆阿丁的美学论集《散文的技巧》里的一些章节——那些章节对她撰写小说的方法作出了解释。她指出自己深受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文学传统之惠，而就自己思想的形成而言，意大利的文学仅居次要地位。她敦促我去请教意大利评论家贾恩·卡洛·维格雷利——他坚持认为她的名望可以与海明威和安德烈·

马尔罗相提并论。她向我提到伯纳德·瓦里——他将《印沙安拉》称为当代的“奥丽亚娜的小伊里亚特”。她对戴维·玛里亚·图兰多大加赞赏——他指出在《印沙安拉》里，黎巴嫩是当代社会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世界。她夸奖沃尔夫冈·罗萨尼——他认为法拉奇非同凡俗的创造力与福楼拜的过人天赋不相上下^[7]。

法拉奇所要求的自我形象在我眼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她是一位艺术家，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文质彬彬、富于教养、博学多才的人。她有权在由伟大的作家如查尔斯·狄更斯、赫曼·梅尔维尔、杰克·伦敦、列夫·托尔斯泰、罗德亚得·吉卜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组成的作家群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她拒绝接受我那些涉及到她成长时期的章节，因为成长期与职业无关，只属于个人。我所掌握的关于她童年生活的信息都来源于业已经过证明的材料。她对旅行和冒险的热爱很大程度上与她早期对杰克·伦敦的崇拜有关。有关那段时期的资料是职业的还是私人的？又一个新难题出现了。她希望我收入《印沙安拉》的评论文章，要求这一部分不仅是全景式的概述，而且是具有立体感的纵深探讨。但当我提到她的出生地佛罗伦萨的重要景色，提到从她的窗户望出去恰好看到城市大教堂的圆屋顶静卧在苍穹之下的壮观景象时，她愤然声称那些材料都属于她个人。

法拉奇坚持要我把每次会面的谈话都用磁带录制下来，并建议我按逻辑把录在 14 盘磁带上的资料分成几个部分——她本人在采访完各界名流和政治巨头后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当她拿到了我长达 500 多页的书稿时，却又拒绝授权给我。她坚持说我没有遵守协议，并强调头两章中充斥着错误。我的解释——书稿的确是侧重于她的写作——纯属徒劳。不论我说什么都没用，她越来越生气，坚持说是我让她开口谈话的，而她允许我录在磁带上材料仅仅成了背景，并没有被用于书中。我心中暗自设想她可

能会做出我的6年级教师席琳修女在对学生交上去的笔记本感到不满时常常做的事。她会打开自己课桌旁边的窗户，然后把所有的笔记本都扔到下面的校园人行道上。那是个令人沮丧的日子，我坐在法拉奇在曼哈顿的公寓里，起居室的窗户真的是开着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学生，坐在他那以体罚为乐的老师面前。我在心里想像着这位著名的意大利作家站起身，踏过波斯地毯，把我的书稿扔到楼下人行道上的情景。

法拉奇反对我写她的母亲托丝卡：当她的丈夫被法西斯分子关进监狱时她是如何为他的安全而奋斗的，她是如何因情绪极度激动而导致流产的。当我解释说有关她母亲的内容证明了她本人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而且这些材料直接来源于她1965年出版的书籍《假如太阳陨落》（不是取自录音带），她又怒目凝视着我，对我的精确度提出了质疑。我试图在她的书中找到一些引文，以便在她面前证明自己，结果的确发现了我需要的东西。“这里，奥丽亚娜，你看。我是从你自己的书中引用的，不是取自录音带。”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法拉奇对我从《假如太阳陨落》中引用的材料说“不”，那么她也会同样轻易地对已出版的文章和采访记说“不”，这样就限制了正当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她严禁我使用《安娜贝拉》杂志上刊登的对宝拉的采访报道，说是她妹妹的叙述在出版之前未经她修正。我觉得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名人下定了决心要严格控制我所写的每一个字，以免影响自己的公开形象。

这位作家执意要求我不提到她的童年或家庭生活，但这些条件不合情理，而且往往自相矛盾。我很快就发现她在自己的书籍和文章中大量提及她的早年生活、她的父母以及对二战的回忆。她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强烈的个性化。我怎能忽略她艺术创作中的这一方面呢？

法拉奇的意向常常会发生180°的大转变，令人难以预料。

她说我这本书里需要收入一小段关于阿莱科斯·帕纳古里斯家庭生活的内容。但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那种只要发现了涉及个人信息的最细微的迹象就会站起来准备开始训斥别人的人。她还希望和我共同撰写这一部分，因为“她爱人的家庭”这一话题十分敏感。后来我提醒她的时候，她只说了一句：“绝不要写帕纳古里斯的家庭。”^[8]预测她的情绪、迎合她的期望是不可能的事。

我又一次修改了整部书稿，希望能令这位作家满意。她说自己善于谋篇布局，曾就本书应采取的形式向我提出过两次建议。我洗耳恭听，仔细录音，认真笔录，然后一丝不苟地按她的指导写作。尽管起初她曾警告我不要触及她的童年生活，但后来又建议我从她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学童生活开始写起，因为她在那时读了不少重要著作并开始渴望写作，这与她原来对我的限制背道而驰，令我目瞪口呆。她认为接下去应该写她16岁时得到的第一份工作——进入了《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之后再写她在《欧洲人》杂志社开始的全国性的新闻事业。下一步，以她的著作来总结她生命中的不同时期。

我忠实地按照这个框架另起炉灶，完成了一部新的书稿，并把引言和头两章寄给了她。我希望这一次能得到她的授权。但她再次拒绝了我，并且在一连串令人沮丧的电话交谈中，她毫不掩饰地发泄着她的愤怒。按照法拉奇的说法，该书的章节顺序完全不恰当；其内容过于私人化，写作水平差劲之极；她感到“被背叛”了。她愤怒地反对书中收录的有关她第一批雇主和她家庭成员的趣闻轶事，但同时又抱怨说我没有讲清她理智与情感的形成过程，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收录得不够。当我怯生生地指出她的前后矛盾之处，并说明我是忠实地按照她认可的大纲进行写作的时候，她越发生气了。我鼓起勇气提出给她读一读笔记以证明我的观点，重建我的可信度。我想要唤起她的记忆的愿望使她大为恼火。

法拉奇把第二稿连同她的评论一起寄还给我，其中包括几条具体建议。但是，这些建议看上去主要旨在彻底摧毁该稿中介绍性部分的结构。她专横地贬低尾注，声称我没有掌握业经证实的材料。她还很过分地命令我把寄给她的那部分书稿烧掉。即便是对待我这样的人，她也做得太离谱了。我在一封愤怒的个人信件里表示抗议：“您命令我烧掉书稿。‘烧掉它’（原文为意大利文）。二战前，纳粹分子也焚过书。您在使用他们的语言——一种听起来十分奇怪的语言，发源于一个所谓的自由与民主的斗士和独裁者的敌人之口——之时，也把自己置于他们的地位。”^[9]

我再次重写了一部书稿。她坚持说我应该回到原来的方案上去，如果她对其内容感到满意的话，那将是她唯一可以授权的书稿。我感到不管她怎么说，唯一能让她满意的办法就是开始重写。1994年2月，我收到她最后一封信，她想知道我是否已经放弃了那个方案。1994年2月16日，我在回信中承认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她的作品并且想让这部传记得以出版。但是，那个时候，我良好的判断力已占了上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忍不住想把另一部书稿寄给法拉奇时，眼前就会有红灯闪烁。“我脑海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要把整部书稿交到您手上。”我写道。

每当有人想拜见法拉奇时，她就怀疑他们只是想看看她如何穿衣打扮、梳理发型，是否有皱纹，有多少，或是她抽多少支雪茄。这位作家说她对这些方面不感兴趣，但又坚持说她就是自己所写的那个样子。对于那些自称真的喜爱她的人，她毫不含糊地发出警告：“私下里会见自己热爱的作家是一种痛苦。”^[10]。大部分情况下，仰慕者都会扫兴而去；他们的期望值太高。真正结识了这位作家，他们就发现她与自己想象的形象大相径庭。法拉奇讲了一件她与一位自己极其尊敬的作家会面的事。尽管他彬彬有礼、赞许不已地评价了一番她的出版物，但作为一个“人”，他在她眼中的形象却一落千丈。“他让我如此失望以致于我不得不

强迫自己继续热爱他的作品。”^[11]奥丽亚娜·法拉奇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承认这一点令我十分难过。我曾是一个虔诚的仰慕者，为了满足她最微不足道的怪念头，我情愿往返一趟中国，但我逐渐变成了冷静的研究者，并决心讲出真相，按照我的发现去讲述她的职业生活，而不是按照她所希望的那样去讲。本书讲述了一位来自佛罗伦萨的妇女如何创造了自己的神话的故事。